

灾害与社会

シリーズ 災害と社会

1

灾害社会学导论

[日] 大矢根淳 浦野正树 田中淳 吉井博明 编著

蔡骥 翟四可 译

《灾害与社会》是日本灾害社会学的集大成之作，本卷作为开篇之作，被称为整套书的“母体”，其他各卷的主题都孕育和萌芽于此。全书以“复元·恢复力”为基本视角，讲述了现代社会应对灾害的历史、灾害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分析了灾害中的生命问题与心理问题、灾害信息以及灾后的生活与重建；探讨了近年呈现的灾害新风险和研究新领域。在灾害全球化的今天，这项灾害社会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学术敏锐性，其论点对中国的灾害防治也极具借鉴作用。



897-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灾害与社会

シリーズ 災害と社会

1

灾害社会学导论

[日] 大矢根淳 浦野正树 田中淳 吉井博明 编著

蔡麟 翟四可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灾害与社会. 1, 灾害社会学导论/(日)大矢根淳等编著;
蔡骥, 翟四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09797-0

I. ①灾… II. ①大… ②蔡… ③翟… III. ①灾害学—
社会学—研究 IV. ①X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7203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灾害与社会

1

灾害社会学导论

〔日〕大矢根淳 浦野正树 编著
田中淳 吉井博明
蔡骥 翟四可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797-0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½

定价: 49.00 元

シリーズ 災害と社会

大矢根淳 浦野正树 田中淳 吉井博明

災害社会学入門

弘文堂 2007 年

根据日本弘文堂出版社 2007 年版译出

总序

日本乃世界著名多灾之邦，地震、海啸、台风、暴雨、火山喷发的发生频度尤高，如1994年到2002年期间，全球范围内6级以上地震共发生160余次，其中20.5%发生在这个国土面积仅占世界总面积的0.25%的国度。置身于这种“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同时受到欧美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二战”以后，灾害研究逐渐成为日本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60余年的蓄积，日本灾害社会学已跻身世界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前列。

一、日本灾害社会学的系谱

论及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先驱，一般会追溯到明治时期的震灾预防调查会和大正时期的临时震灾救护事业局。1891年浓尾大地震之后，明治政府组建震灾预防调查会，通过它重点展开四

项工作：调查此次震灾损失的各项具体数据；进行地震科学的测定、观察和调查；研究建筑物的抗震性能；及时公布上述各项调查研究成果并将之作为制定相关社会政策的重要依据。此后数十年里，作为国家层面的灾害对策研究机构，震灾预防调查会始终是日本灾害对策研究的核心。1923年关东大震灾之后，大正政府立即成立临时震灾救护事业局，负责全面指导和协调抗震救灾工作。从灾害社会学研究角度来看，临时震灾救护事业局在震后两个月实施的一项调查特别值得一提。与以往的灾害调查相比，这次调查具有一个鲜明特点：开始关注灾后复兴的问题。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为把握震灾导致的人口移动以及灾区外迁人口的生存状况和返乡意愿，把调查区域扩大到日本全国，而不只局限于受灾地区；第二，为给受灾地区复兴规划提供具体依据，调查内容以受灾人口的“就业”和“住房”状况为重点；第三，把调查结果作为制定受灾地区公共住宅政策的直接依据。因此，这项调查被认为是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另外，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关于东京大轰炸和核爆炸受害者的调查研究也是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史册中的重要一页，不过其研究主体主要是美国的一些研究组织。

一般认为，1964年关于新潟大地震时的恐慌行为及灾害

信息的美日合作研究，是作为纯学术研究的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起点。而参加这一研究的安倍北夫、秋元律郎和冈部庆三等学者，则被日本灾害社会学界公认为第一代学者的代表。安倍的主要业绩在于，通过对城市居民的灾害应急行为的系统分析，归纳出决定生死的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助于成功逃生的应急行动模式。秋元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战后美国灾害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和研究个案的梳理，归纳出“战后美国灾害社会学发展阶段说”；二是将美国灾害社会学理论运用于日本的灾害案例研究，提出日本城市灾害的组织应对模式；三是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冈部主要以人际交往理论为分析工具，推进了灾害信息（警报、避难指示及避难劝告等）和避难行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此外，山口弥一郎也是日本灾害社会学第一代学者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他对明治时期以来多次遭遇海啸灾害的三陆地区渔村进行了长达八年的实地调查，依据翔实的一手资料，一方面运用民俗学理论解释灾区居民的家系和生业的复兴过程，另一方面运用地理学方法分析灾区居民在迁居高地后重建居民共同体的过程，并对那些渔村在近半个世纪中重复“受灾—复兴—再度受灾”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为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成果。

就学者梯队而言，日本灾害社会学至今已有六代学者^①。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实施大量吸收学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国策。在这一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学者以吉井博明和广井修为代表，他们在研究重点上，承继第一代学者的传统，继续致力于灾害信息研究；在研究取向上，开启了作为“智囊团”参与重大法律法规和政府决策制定的先河。如吉井、广井分别承担了政府关于宫城县冲地震、伊豆大岛近海地震等灾害的受灾状况调查的组织工作，还直接参与了《大规模地震特别措施法》等重要法规的制定。可以说，推进灾害信息研究和积极服务于国家的防灾对策是第二代学者的两项主要功绩。20世纪80年代这十年里，日本没有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这使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学者得以潜心反思和整理以前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灾害社会学基本理论著作，如《都市灾害的科学》（安倍北夫、秋元律郎，有斐阁，1982）、《现代的精神 181号，都市和灾害》（秋元律郎，至文堂，1982）、《灾害和日本人》（广井修，时事通信社，1986）、《灾害报道和社会心理》（广井修，中央经济社，1987）、《对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广濑弘忠，新曜社，1981）等。而山本康正、浦野正树、广濑弘忠、田中淳、林春男、田中重好等一

^① 此为大矢淳根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阐述的观点。

批年轻人在参加这些著作的资料整理和参与撰写的过程中，成长为第三代学者。大矢根淳、横田尚俊、中森广道、山下祐介、渥美公秀等第四代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研究生涯，到 1995 年阪神·淡路大震灾时成为受灾地长期研究的中坚力量。在阪神·淡路大震灾时初涉灾害社会学研究的菅磨志保、越山健治、永松伸吾、关谷直也、浅野幸子等人，在之后接连发生的芸予地震、中越地震、能登半岛地震等灾害中积累起研究经验和成果，成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的重要生力军，被称为第五代学者。而活跃于 2011 年东日本大震灾研究第一线的一批新人，正在成长为第六代学者。

从研究本身来看，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进步显著，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研究者增加；二是研究领域扩大；三是受灾地长期调查研究方法得以确立；四是灾害共生对策研究成为核心主题。究其背景，以下两点十分重要：（1）新暴露的灾害问题促使更多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投入灾害与社会的研究，从而拓展了灾害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 1983 年日本海中部地震引发的海啸，致使上百人丧生，这促使信息科学和灾害社会学联手致力于海啸警报迅速化问题的研究；遇难者中有 13 名参加学校郊游的小学生，

这使学校如何在突发灾害中保护学生生命的问题成为教育学与灾害社会学共同面对的新课题。沙林事件、东海村 JCO 核燃料处理临界事故以及美国“9·11”恐怖事件等重大人为灾害的发生,使危机管理成为灾害社会学的研究对象。(2) 1959 年伊势湾台风之后的近三十年里,日本没有发生过一次死者超过千人的灾害,但 1991 年之后,云仙普贤火山喷发(1991 年)、北海道西南冲地震及其引发的奥尻海啸(1993 年)、阪神·淡路大震灾(1995 年)等重大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其带来的避难生活和复兴建设的长期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使受灾地长期研究成为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并得到广大民众的肯定和支持。^①而重大灾害的频繁发生以及关于首都圈直下型地震、东南海·南海地震的预测,则使灾害共生实践成为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日本灾害社会学的基本框架

以集合行动论、社会信息论、组织论和地域社会论为基

① 据大矢根淳教授介绍,在此之前,灾害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受灾地长期研究,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甚至被讥讽为“把他人的不幸当饭吃”。

本视角的研究，构成了日本灾害社会学的基本框架。^①

1. 集合行动论视角

在灾害社会学研究中，集合行动论主要被用于关于恐慌（panic）、流言、掠夺、救助、反对相关行政举措的居民运动以及以灾民为主体的地区复兴运动等受灾地民众的集合行动及其机制的分析。

在研究范式方面，集合行动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学研究经历了由“崩溃论”到“创发论”的转换。20世纪70年代之前，关于灾害时集合行动机制的主流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崩溃论”的范畴，以“致灾因子引起外部物理环境崩溃→社会系统崩溃→行为规范崩溃”为研究假设的基本模式。这种“崩溃论”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开始受到质疑，研究者的关注焦点逐渐移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人们的行为规范如何在灾害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得以重构或创新的问题，“创发论”的影响力随之渐次增强。“创发论”关于危机状态下的行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和创新及其机制的研究，不仅为说明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创发行动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而且为解释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结构变化及结构性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① 参看田中淳等：《集合行動の社会心理学》，北树出版，2003年；田中淳：“災害と社会”，船津卫等，《21世紀の社会学》，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5年。

在研究对象方面，集合行动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也有明显变化。恐慌行为曾经备受关注。这里所说的“恐慌”，指人们在感到自己的生命财产面临危险时发生的一种争先恐后地“趋安避难”的集合性行为。由于恐慌行为不仅会妨碍人们顺利逃生，而且往往会直接造成人员伤亡，因此早在 19 世纪末就有不少学者从心理学和集合行动论的视角研究它的诱发因素和预防措施，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无论就世界范围而言，还是就日本而言，它都是灾害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对象。但是，大量案例表明，灾害时很少发生恐慌行为，人们未能成功逃生的原因大多在于没有及时采取恰当的避难行动。于是，研究重点就从如何避免恐慌行为转移到如何推进避难行动。此外，随着上述研究范式的转型，救灾志愿者、救灾组织以及社区的活动也都成为主要研究对象。

2. 社会信息论视角

如果能够及时地得到准确的灾害信息，人们就会采取适当的避难行动——这一假设是社会信息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视角下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灾害信息本身的研究（如分类及体系构成、内容及表述形式等）；二是关于灾害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的研究（如各类媒体灾害信息报道的特点及互补、发布过程等）；三是关于灾

害信息的处理和接收的研究（如灾害信息及其报道的负功能、灾害信息处理体制、灾害信息共享系统、救灾组织间的信息沟通等）；四是关于灾害文化和防灾教育的研究。

3. 组织论视角

E.L. 库朗特利（E.L. Quarantelli）和 R.R. 戴恩斯（R.R. Dynes）领导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灾害研究中心曾提出一个关于救灾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分类的分析框架，以组织结构和组织活动内容两根轴线，根据灾害发生前后有无变化对组织进行分类，并对各类组织的特性和功能进行实证分析。秋元律郎、山本康正将这一分析框架导入日本的灾害社会学研究，而在他们及其后辈研究者的研究实践中又有许多独创性的发展。如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关于长崎暴雨灾害的调查研究和野田隆关于山体滑坡灾害的调查研究中，在关于各级行政组织的职责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①阪神·淡路大震灾研究开启了关于创发型（emergence）救灾组织的研究；还有学者把“自助”、“共助”和“公助”的理念与组织理论相结合，对灾害相关组织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分析。^②

① 参看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灾害与信息研究组的研究报告《1982年7月長崎水害における組織の対応》（1983年）和野田隆著《災害と社会システム》（恒星社厚生阁，1997年）。

② 大矢根淳等：《災害社会学入門》，弘文堂，2007年，第32页。

4. 地域社会论视角

在灾害社会学领域，S.H. 普林斯（S.H.Prince）和 P.A. 索罗金（P.A.Sorokin）分别是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开创者，而两者都特别关注受灾地区灾后的长期社会变化。灾害不仅表现为灾害因子引发的瞬间物理性冲击，还表现为这种冲击导致的受灾地社会长期变化的整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以地域社会为对象的灾害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灾害社会学研究。对于重大灾害频频发生、东南海·南海地震和首都圈直下型地震等巨大灾害随时可能发生的日本来说，地域社会论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学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不仅关注灾害对受灾地社会的长期影响，还关注漫长历史中积淀下来的地域文化对灾害的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灾害从哪些方面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当地社会，受制于当地居民共有的地域文化，正是地域文化左右着人们灾前准备、灾时应对以及灾后复兴的行动。

三、日本灾害社会学的重要概念

1. 灾害

C.E. 佛瑞茨（C.E. Fritz）、A.H. 邦顿（A.H. Barton）、E.L. 库

朗特利等人都把灾害看作一种社会系统因遭受突发的而且具有破坏性的冲击而偏离常态的现象。其中，A.H. 邦顿明确地把致灾因子、物理性破坏及其引起的社会系统变化看作灾害的三个基本要素，提出分析这种社会系统变化的四个角度：（1）以受灾地为中心的地理区分（直接受冲击区域、过渡区域、救援区域、外部区域）；（2）灾害的时间过程（社会准备期、预知·警告期、非组织性反应期、组织性应对期、复旧·复兴期）；（3）各种层面的社会单位（受灾者、组织、地域社会、国家及国民社会整体、国际社会）；（4）灾害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社会系统遭受的灾害、社会系统的灾害应对）。A.H. 邦顿的观点很早就被引进日本，成为日本社会学灾害认知的理论依据。

日本灾害社会学的灾害概念，也是研究者在长期研究实践中达到的灾害认知。在日本灾害社会学发展史上，岩崎信彦等人主编的三卷本《阪神·淡路大震灾和社会学》（『阪神·淡路大震災と社会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那里，“灾害”被如此定义：“对于社会系统来说，灾害是一种突发事态。在物理性空间轴上，受灾区域呈现为以受灾地为中心的同心圆。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日常社会系统突然遭遇灾害，其影响会波及各个层面的各种社会单位；同时，对灾害的社会应对

也表现为各个层面的各种社会单位在紧急应对、复旧、复兴等不同阶段的行动过程。”^①

2. 灾害共生论

人类关于灾害原因的认知最先是在“天灾论”层面，并且经历了一个从敬畏超自然之“天”到求索自然规律的过程。这一点，日本民族也不例外。二战以后，随着上述基于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灾害概念以及“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复元·恢复力”（resilience）概念的引进，日本灾害社会学对灾害原因的认知从“天灾论”层面飞跃到“人祸论”层面。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政府和民间集中力量治理河流、修建水坝、保护和培植森林，从多方面积极开展以防灾减灾为目的的国土建设。而在此期间，日本没有发生过一次死者超过千人的灾害。这使人们乐观地相信：人类可以消除灾害。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大灾害接踵而来，而日本又是一个国土面积狭窄的岛国，不可能把灾害频发地区都宣布为“不宜人居之地”。这一特殊环境孕育了一种新的灾害观：容纳灾害，与其共生。这种灾害共生论成为日本灾害社会学的一个新的理论支点。

对于上述灾害共生论，可从三方面把握。首先，其核心理

^① 岩崎信彦等：《阪神·淡路大震災と社会学》第3卷，昭和堂，1999年，第323页。